

“沙拉碗”式融合理念下的新加坡华族社群融合研究

史秋霞

(江苏师范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在“沙拉碗”式融合理念下,新加坡华族社群融合既包括新移民融入新加坡华人社会,也涉及华族成员在该体系中的流动。受外部环境与华族社群的双重冲击,新加坡华族底层成员最有可能面临向下流动的风险,而新移民在承受更多的政策压力下融入进程延长,甚至中断。新老华族清晰的群体边界及内耗型互动也在社会事件与日常交往中不断强化,且影响着华族整体凝聚力的提升。

[关键词]族群融合;社会环境;华族社群;双重压力;融合裂痕

[中图分类号] D52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287(2018)02-0087-10

一、问题缘起

社会融合是不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相互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1],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石。各族群与主流社会的关系以及族群间的互动必然对多族群国家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如果某些族群长期遭受排斥,不能从国家发展中平等获益,而凭借自身或族群资源又难以向上流动时,社会的稳定必将面临严重威胁,如2005年法国巴黎骚乱^①、2011年的英国骚乱^②及2014年美国弗格森骚乱^③都在不断告诫我们族群融合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国情有别,各族群在人口、规模、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均有差异,这就使得国家决策层与学术领域对族群融合的内涵、作用机制

[收稿日期]2017-07-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不同社会群体间社会距离及其弥合机制研究”(15CSH006);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公平及保障机制研究”(2016SJB840011)

[作者简介]史秋霞(1982-),女,内蒙古乌海人,江苏师范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城乡社会学。

①2005年在法国发生的骚乱,起因是巴黎郊区克里希丛林市两名北非出身的男孩躲避警察时被电死。当地青少年发起首次骚乱,后蔓延至巴黎郊区多处,一星期后蔓延到法国其他城市。由此引发的讨论认为,二战后法国实行多年的融合多元文化的社会政策,已全面失败。法国极右领导人勒庞指责说,来自第三世界的、无法控制的大规模移民导致了法国城镇长达3周的骚乱。此骚乱也引发英国、德国等国对其多元文化的政策开始检讨,限制外裔居民日益扩大的影响。资料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05年法国骚乱>。

②有传媒称为“伦敦之灾”“伦敦暴动”,2011年8月6日晚,英国首都伦敦开始了一系列社会骚乱事件,一直持续到8月10日才平息。骚乱的导火索是2011年8月4日在伦敦北部的托特纳姆(Tottenham),一名29岁的黑人男性平民马克·达根(Mark Duggan)被伦敦警察厅的警务人员枪杀,之后民众上街抗议警察暴行。当地人认为是英国的经济不景气,加上政府撙节支出,冲击了托特纳姆等高失业率地区的经济状况而引发社会不稳定。资料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1年英国骚乱>。

③也称为“迈克尔·布朗命案”,于2014年8月9日发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县弗格森。事发时,18岁的非裔美国青年迈克尔·布朗在未携带武器的情况下,遭到28岁的白人警员达伦·威尔逊射杀。这起事件引发连续多日的抗议行动,甚至出现暴动,警方派出大量警员、装甲车,并发射了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试图平息骚乱,FBI也已经介入调查。资料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邁克爾·布朗命案>。

及应对措施有着不同的思路。

新加坡社会主要由华族、马来族、印度族与欧亚裔族群构成,据2010年人口普查第一批数据显示,华族人口为76.2%,仍为新加坡最大族群^①。除通用语言英语外,各族群有着明显不同的语言与宗教信仰。从收入来看,华族家庭有着明显的优势^[2]。如果将美国社会的融合理念称为大熔炉(melting pot)的话,新加坡更像沙拉碗(salad bowl),该理念反对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靠拢,在保持族群文化独特性的基础上建构国家认同。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新加坡各族群不仅在宪法上实现了平等,专门机构的成立进一步确保了种族和谐局面的稳定。如果将族际通婚视为族群融合的重要指标的话,新加坡族际通婚比从1997年的8.9%上升至2007年的16.4%,可谓族群融合状况最好的证明^[3]。

为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新加坡宽松的移民与劳工政策多年来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带来经济效应的同时,也引起新加坡公民的不满。长期的疏离和隔膜,加之政治体制、教育背景、社会习惯和文化价值观的不同,虽同属华族成员,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与本土华人之间产生了“近亲憎恶感”^[4],影响了华族新成员的融入及华族凝聚力的提高。同时,随着新加坡经济增长模式逐渐向知识、资本密集型转变,劳动力市场的巨大变动也将增大阶层固化的风险,尤其对于收入与子女教育成就方面均处于弱势的马来族而言更是如此。看似不同面向的融合挑战其实有着密切联系,如外来人口的涌入将加剧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增大弱势族群向下流动的风险,而外来人口中众多华人面孔的出现又使这场竞争在影响华族内部和谐的同时也同样影响着族际关系。作为最大的族群,新加坡华族社群内部的高凝聚力、族裔资源的有效流动,外部与其他族群的团结互助都对新加坡社会的稳定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那么,在“沙拉碗”式的融合理念之下,新加坡华族社群面临哪些融合压力?这些压力对华族社群融合又产生了哪些影响?本文将结合族群融合理论的分析视角系统剖析新加坡华族社群融合现状及存在的裂痕。

二、关于族群融合

1. 从线性融合到曲线融合

线性融合理论(classical assimilation)将移民即将融入的主流社会视为由白人中产阶级构成的社会,融合则是去除本族身份,获得主流社会身份的过程。随着时间推移和移民的努力,所有移民最终都能融入主流社会。其中,芝加哥学派代表 Park 将融合过程归纳为接触、竞争、适应、最终融入主流社会,生物性竞争和社会性沟通与合作是影响融合的重要因素^[5]。Warner 等则强调社会阶层、种族等结构性因素可能影响居住和职业进而影响融合进度^[6]。Gordon 关注融合的多维性和关联性,他认为移民融合涉及七个方面,结构性融合是融合的基石^{[7][8]}。然而,当非欧裔移民逐渐增多且在融合过程中出现巨大差异时,该理论就难以给出合理解释,强调融合过程曲折性的曲线融合理论(bumpy-line assimilation)应运而生。

曲线融合理论虽从不同侧面展现出融合进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但无论融合进度如何,最终结果还是族裔特征完全消失,完成“盎格鲁—撒克逊化”(Anglo-Saxon)。Gans 将那些因缺少流动机会而

^①参见:周殊钦. 数据显示:华族仍是新加坡最大种族,占人口76.2% [N]. 联合早报, 2011-01-14.

更接近失业、犯罪、酗酒和吸毒的移民子女称为“第二代的堕落”,他们融入主流社会的进度被拉长^[8]。Perlmann 等也发现,受各种外在因素与内在因素的共同影响,并非所有移民子女的融合过程都一帆风顺^[9],Alba 等也认为线性融合理论无法展现主流社会环境与移民自身特征之间的交互关系对融合的影响^[10]。

2. 分层融合理论

分层融合理论(segmented assimilation)将主流社会视为由不同阶层、种族构成的社会体系,由于阶层、种族以及个人与社会的互动不同,移民子女融合过程及结果也呈现多样性,而融合方向可分为:①放弃原有文化、价值观与行为规则,完成“盎格鲁—撒克逊化”;②融入反对中产阶级白人的本土亚文化,一般来自社会底层;③策略性选择保留族裔特征并构建族裔网络,依托族裔经济融入中产阶级^[11]。迁移前后的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塑造着移民子女的生活机会及融合方向^[12]。例如,社会经济地位往往决定着移民家庭在流入国的居住空间、就读学校与交往人群,进而影响融合方向。收入差距及制度性区隔致使新来移民大多进入蓝领阶层^[13]。和谐的代际关系能够抵御子女面临向下融合的风险^[12],而族裔社区可能给移民子女带来丰富资源与自豪感,或是劣势族群地位与自卑感^[14]。当向上流动遭遇“天花板”时,受负面情绪影响,底层青年更有可能以挑战权威,否定中产阶级价值观与道德体系的生存方式来维护自尊^[15]。

3. 新加坡族群融合研究

新加坡族群融合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主流社会内部各族群的融合研究,主要以促进族群和谐共处的融合政策为侧重点,探讨较多的当属公共住房政策(public housing)和多元文化政策(cultural pluralism)。以提供住所、使居民拥有房产、搭建社区纽带和构建活动社区为目标的公共住房政策,通过种族配额(quota)有效降低了种族间的空间隔离,与之配套的社区组织及活动提高了族际互动^①。当然,因工作单位(而非家庭或社区)是人们的主要社交场所,居住融合是否为族群融合的有效测量指标也受到质疑。多元文化政策被视为新加坡文化,努力试图在尊重族群差异性的基础上构建“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感。对族群公平性与差异性的重视,使各族群能通过公平竞争实现流动^[16],但有意固化的群体边界,是否有利于族群间的理解、互动及国家凝聚力的形成还有待商榷。

二是移民与新加坡社会的融合研究,该领域以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新移民为主,我们主要关注华族移民与新加坡社会的融合,分析大量新移民的涌入对新加坡社会及华族群体带来的影响^[4,17]。虽同属华族社群,中国新移民与新加坡华人可谓两个不同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群体^[18]。对新加坡华人来说,作为专业人才引进的新移民在各方面均占优势,原有差异加之竞争导致双方陷入认同困境^[19],很难在短期内接纳对方。因此,如何使没有明显纽带关系的华人新移民融入新加坡华人社会是需要政府、民间组织和学界共同探讨的问题。然而,现有研究大多来自政策视角,对于移民政策及后续融合政策如何促进移民融入新加坡主流社会所谈甚少^[20]。

^①See TAY K P. Building vibrant communities through effective public housing polic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housing conference: housing in the new millennium, 2000, Singapore; SIM L L, SHI M Y, SUN S H. Public housing and ethnic integration in Singapore [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03, 27(2): 293-307; ROSEMAN C C, LAUX H D, THIEME G. Ethni city: geographic perspectives on ethnic change in modern cities [J].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6, 19(1): 91-93.

4. 本文的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族群融合的理论 with 经验研究,本研究将遵循以下研究思路来认识并剖析新加坡华族社群的融合状况。首先,新加坡社会也是由不同阶层、种族构成的社会体系,国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阶层流动的制度化障碍。其次,华族社群融合具有一体两面的特征,既包括新移民融入华人社会,也包括华族成员在新加坡的社会体系中流动。再次,族群融合是动态过程,而非静态结果,受多方因素影响融合道路呈现多元特征。同样,华族社群的融合也将受到外部社会环境与内在社群状态的共同影响。

本文研究资料主要来自各类已有文献与实地参与调查。为展现新加坡华族社群融合所面对的外部环境,笔者广泛收集新加坡各职能部门的工作报告、相关新闻报道及已有的学术研究。同样,为深刻体会华族社群的内部状态,笔者于2015年初注册成为新加坡最大华人社团——华人自助理事会(以下简称“华助会”)的义工,并在2015年3月至2016年3月不间断地参与该社团开展的活动。需要说明的是,与自发形成的传统社会组织不同,“华助会”属于半政治半社会性的非营利组织,是新型华人组织的典型代表,在华族社群融合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不同场合下,笔者广泛接触社团中的义工、受助者、工作人员,并为之进行深度交流,以期达到对华族成员自身感受的多角度体验与认识。

三、内外双重融合压力:社会环境与华族社群

新加坡华族社群所面临的社会环境主要蕴含于其社会结构与社会政策之中,而华族社群内部则应关注社群的特征、社团组织及成员交往,内外力量双重作用,将给华族社群融合带来诸多融合压力。

1. 由外至内的社会环境压力

多年来,对“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执著追求确实使新加坡经济发展迅速,但也付出了社会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的代价。新加坡收入差距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基尼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的0.4上升到2008年的接近0.5。收入与代际流动具有相关性,当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时,代际流动将会下降^[21],这也意味着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子女可能仍旧处于经济劣势。依据能力的教育分流成为新加坡教育的标志特征,但也导致了代际流动的降低。分流始于9岁,经过中学,直至进入不同等级的高等院校,费用与课程安排的巨大差异使学生难以在不同类型学校间流动。高等教育扩张对贫困家庭子女益处也不大,一方面,政府的教育支出多投入于大学而非工艺学院;另一方面,富裕家庭子女更倾向于通过大学文凭获得高收入职业,工艺学院则是低收入家庭子女的主要选择^[22]。新加坡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分割:一端是服务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专业人才,薪酬由国际劳动力市场决定,生活优越;另一端是服务于本地的低技能劳工,收入较低。底端的工作经验很难置换为获得高端工作岗位的资本,在开放的移民政策下大批涌入的外籍移民进一步加大了就业竞争。

新加坡政府也为缩小社会差距,激活社会流动做出各种努力,如对有工作能力的个人进行经济援助,将工作福利作为永久福利纳入社会安全网(social safety net)中等。但是,为经济服务的发展型福利模式(developmental welfare model)仍以保持经济竞争力为目标^①,诸如退休储蓄计划^②(retirement

①根据2010年和2011年的Ministry of Finance。

②对新加坡的退休储蓄计划进行说明。

savings scheme)、中央公积金^①(the Central Provident Fund)等福利设置更加强调个人责任,经济援助也多为培训和就业安置。

如果说上述环境对新加坡社会中的个体均有影响,那么在“新加坡人优先”(Singaporeans-first)设计思路下,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间的福利差距,则主要针对外籍人口,尤其体现在住房、教育与医疗上。在购房上,永久居民要缴纳的印花税远高于公民,且必须在永久居民身份满三年后才能购房。在教育上,永久居民没有政府补贴,需要缴纳较高学费,在入学机会上也排在公民之后。在医疗上,永久居民在诸如门诊费、住院补贴、手术补贴、儿童疫苗等费用方面和新加坡公民差别很大。可以说,在“新加坡人优先”政策下,永久居民虽然获得了合法的长期居住的权利,但实质上只是“二等公民”而已。

2. 由内向外的华族社群压力

新加坡政府虽倾向将30多万中国新移民^[23]与本国华人视为同一族群,但无论是本国华人还是新移民内部均有显著差异。新加坡华人主要由福建人和广东人构成,在语言、职业、风俗习惯、宗族势力等方面大为不同^②。华人新移民则不只局限在华南侨乡,人员构成更加多元,有以留学生、专业人才为主的技术移民,也有以劳工为主的劳务移民,经常性的跨国生活方式也使其认同居于“落叶归根”与“落地生根”之间^[24]。

早期华人依据血缘、地缘关系组建起来的传统社团组织弥补了其初来乍到时的资本匮乏,“抱团取暖”的生存方式使其能够顺利地在新加坡安家立业。如今,一方面新加坡政府机构致力于建立跨越族群的国家认同,传统社团组织的办学、就业等功能逐步外移,娱乐、联谊功能被其他组织所取代;另一方面年轻的新加坡华人宗族意识淡薄,传统社会组织对他们的吸引力不足。因此,注册的宗族社团组织虽多达300多个,但都逐渐面临会员减少与经费缺乏的困境^[25]。华人新移民的到来为这些组织带来了新鲜血液,但因需求不同也带来了新的挑战。除传统社团组织外,新移民也纷纷自发成立了更具包容性的社团,如天府同乡会、天津会,涵盖范围摆脱了原生纽带束缚^[26]。新社团组织在促进华人新移民融合方面功不可没,但也存有不足。例如,会员多为专业人士和商人,组织的工具色彩较浓;成立时间短,缺乏运作经验,缺乏有较强经济实力和威信的侨领,组织间互动较少,部分社团融入主流社会的意识较弱,与新加坡基层社区的互动不够充分等^③。可以说,传统华人组织进入摸索发展期,新移民组织则进入完善发展期,需要在新环境中重新定位自身发展及对华人社会融合所发挥的作用。

新移民和本地华人在政治体制、教育背景、社会习惯和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差异显著,而新移民的到来也确实给本地华人带来了各种冲击,如挤占当地的住房、教育、就业与医疗资源。以差异性与竞争性为前提的日常交往必然容易产生误解甚至冲突,彼此间形成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如新移民认为新加坡华人文化根基浅薄、不中不西、夜郎自大,具有“小国心态”;而一些新加坡华人则批评新移民的穿着、谈吐、英语表达及看不起新加坡人,具有“中原心态”^④。

①对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计划进行说明。

②根据《2011 华侨华人研究报告》《海外华侨华人概述》相关资料整理。

③参见:华助会的内部刊物《动力华社》2011年10月刊,第3页。

④参见《亚洲周刊》2004年第18卷17期(2004年4月25日)。

四、挤压下的融合裂痕：华族底层与新移民

在两股力量的共同挤压下，华族社群成员及其后代的生存与发展将面临许多风险，这些风险如同精美艺术品上丝丝细小的裂痕，虽不起眼，但其存在及蔓延他日必将成为影响价值的重要瑕疵。

1. 底层成员：面临向下流动风险

新加坡产业的不断升级致使从事劳动密集型或低技术岗位的华族底层成员最有可能面临失业。结构性失业通常需要进行再培训才会有更好的就业机会，但诸如培训信息、培训费用与时间加之华族成员及家庭的实际情况，都使结构性失业问题更加地复杂化。

个案一：只有中一教育程度的 Y 先生（44 岁）原本在樟宜机场当物流督工，每月工资两千多元，日子过得还不错。不幸的是，他在 2008 年的金融风暴中被裁退，失业半年。眼看储蓄快要用完，三房式组屋房贷无法按期偿还，还必须照顾 64 岁的母亲，Y 先生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①。

个案二：X 先生有两个孩子，他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担任驾驶指导员 19 年。原本只负责指导第三级普通轿车驾驶课程，时日久了，逐渐觉得工作发展停滞不前，收入也受技能不足所限而无法上升。2008 年，正逢经济低迷期，他发现许多雇主为削减人力，要求雇员身兼数职，兼任货物递送与管理仓储等任务。这样一来，考取第四、五级重型车辆的学员增加了。形势的改变，让 X 先生开始忧心自己饭碗难保。他说：“我长期以来只指导第三级驾照课程，我知道自己的技能不够全面。不过当时收入很少，根本没有余钱报读课程，提升自己”^②。

X 先生和 Y 先生的职业生涯都受到金融风暴的冲击，Y 先生失业半年靠积蓄度日，X 先生也走在失业边缘。经济回暖后，也许 X 先生能够找一份相近的工作，Y 先生也兴许能够保住饭碗，但这些底层成员在社会环境压力面前的脆弱性却一直留存。同时，失业风险还会影响家庭的生活质量和子女的教育投入。

个案三：刚毕业于 YZ 小学的 ZH 来自单亲家庭，母亲是糕点制作助理，微薄的收入加上忙碌的工作让她没有时间好好管教孩子。ZH 原本英文和数学成绩很弱，处于刚刚及格的水平，母亲一直担心他无法通过会考^③。

在新加坡复杂的教育分流路径下，各阶段不同等级学校间的差异也发挥着隔离功能。虽然弱势学校也会有优秀学子升入优势学校，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接受何种等级的基础教育将预示着将来所获得的中等、高等教育的质量，甚至所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层次。ZH 的后代，家庭所能给予的经济支持与学习辅导都非常有限，若无其他途径的支持，则非常有可能因学业失败而与借助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道路渐行渐远。

2. 新移民：融合进程受阻或中断

与本土华族成员所遇问题不同，新移民一般具有较高的经济水平与专业技能，面对环境变化所带来的经济压力有较大韧性，但对政策压力却难以抵御。因身份不同，新移民中已入籍的公民与永久居民所承受的政策压力有相同之处，也有自身特有的。由迁移带来的社会支持网中断与重塑以及由差

^①资料来源于华助会的内部刊物《动力华社》2013 年 6 月刊，第 13 页。

^②资料来源于华助会的内部刊物《动力华社》2013 年 6 月刊，第 3 页。

^③资料来源于华助会的内部刊物《动力华社》2012 年 1 月刊，第 10 页。

异与竞争带来的与本地华族成员的关系紧张是二者均需面对的,而“新加坡人优先”之下的“二等公民”处境则主要针对永久居民。

个案四:XC夫妇均为南洋理工大学博士,毕业后顺利拿到PR并在新加坡定居。XC女士在分娩前几天还在公司上班,因为PR和公民的产假不同,只有12周。为了能够更好地照顾XC女士“月子”,婆婆算好日子,打算预产期之前一个星期来新加坡,因为婆婆探亲签证时间有限。没想到XC女士离预产期还有两周就分娩了,分娩时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孩子“满月”后,婆婆签证期满须回国待一段时间再来,期间XC女士虽然在休产假,但也没有人照顾。XC女士说,有一天真的太累了,抱着孩子睡着了,结果把孩子摔到了地上。开始的时候,孩子留在新加坡,婆婆回国后再来,但觉得这样老人很辛苦,就让孩子和婆婆一起回国,然后再来。现在孩子已快2岁了,每2~3个月就往返一次。XC女士认为,孩子的语言和认知能力都比同龄孩子慢很多,虽幸运地排上了幼儿园的号,但孩子自理能力还不够,推到了明年,但具体明年是否有名额就不清楚了。XC女士说她认识的人当中,很多人到孩子上学时都非常苦恼,有的上幼儿园排不上号,到了年龄但没有名额;有的排上号有名额,但学校不好,觉得孩子在这样的学校上学彻底废了。XC先生2015年春在深圳找到一份中层管理的工作,长期分居,孩子和老人则定期往返于新加坡与深圳。明年孩子上学后,打算公婆替换照顾孩子。对于未来,XC女士非常迷茫,也在纠结要不要回国发展^①。

无论从经济、情感、还是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考虑,养儿育女都是父母的重要职责,当年轻夫妇忙于工作时,隔代抚养顺理成章成为抚养后代的首选。然而,由于父辈无法在新加坡长期居住,不仅孩子无法在熟悉的环境中成长,本应享受天伦之乐的父辈也要疲于往返两国。此外,上幼儿园没有名额需要推后入学,学校名额满时只得选择差学校等,这些永久居民无法逾越的制度障碍使得子女在进入以分流为标志特征的教育体系时已处于劣势。制度性限制还使永久居民出现“想回国”“迷茫”等负面情绪和摇摆心理,也更加强化了对国内支持网络的依赖与情感归属,无形中延长了在新加坡社会的心理融入过程,甚至直接中断。值得注意的是,永久居民所体现出的摇摆心理也使本地华族成员更加认定其机会主义者的形象^[27]。

3.新老华族:边界清晰,内耗型互动

新加坡华人倾向将同族新移民视为他群体成员,而将新加坡异族公民(印度人、马来人)视为内群体成员^[27]。2011年的“咖喱风波”能深切感受到华族内部清晰可见的群体边界。

咖喱风波原委^②:

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不习惯印度邻居的饮食习惯——咖喱味道。在印度家庭烹饪时将门窗关上后还无法接受,最终前往新加坡社区调解中心,寻求仲裁。调解员Marcellina Giam进行调解,经双方协商,印度家庭只有在华族家庭没人时,才能烹饪咖喱^③,而华族家庭则承诺试试咖喱菜肴。然而,仲裁结果引起新加坡人的强烈不满,有4万人打算在周末以用咖喱做菜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国民自豪感。当然,对于这场咖喱风波,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

^①资料来源于笔者与访谈对象长期接触后的总结。

^②关于“咖喱风波”的相关资料来源于《新加坡中国人的咖喱战》,南洋视界 <http://www.nanyangpost.com>。

^③《今日报》在2011年8月11日刊登了调解中心负责人的来信,信中澄清,调解员并没有在当时作出裁决,而是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协助双方的讨论。而最终的结果,是其中一方提出的建议,另一方表示同意。

《今日报》网站留言者 Rosalind Lee: 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告诉我的同胞不要煮咖喱,我感到怒火中烧。几乎所有的新加坡人的家庭都煮咖喱。这位调解员应该告诉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作(做)出调整,接受新加坡人的生活方式,不要让本地人调整成外国人的生活方式。

《南洋视界》读者来信:作为一个新加坡人,当然对这样的事件不悦,但我知道我不能用它来判断所有在本地的外国人,无论是来自中国还是其他地方。那个印度族家庭同意在他们的邻居不在家的时候才煮咖喱,而邻居则必须尝试一下咖喱菜。我要说,让我们用咖喱团结而不是分化。让我们在星期天“煮一锅咖喱”,邀请新加坡或者非新加坡朋友以及邻居来拥抱我们的咖喱——印族、华族、马来族和欧亚人士——让我们用咖喱进行积极改变。

本属生活习惯引起的邻里纠纷,为何能触发如此广泛的社会情绪?已有研究表明,新加坡华人不将自己与那些富有的新移民视为同族,认为是他们的祖先在新加坡最艰难的岁月中拼搏,而新移民却直接享用了拼搏后的繁荣。上述观点中,无论是对新移民的不满表达,还是呼吁理智面对,均将新移民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外国人”“非新加坡朋友”等他群体成员身份,而印度家庭则被视为“同胞”“本地人”。类似的社会情绪爆发并非偶然,2012年5月12日“中国富豪新加坡驾豪车事件”也掀起了新加坡的排外浪潮,一时间社会舆论、网络平台“将中国人赶出新加坡”的声音络绎不绝,甚至将其称为“富豪蝗虫”。在新加坡年轻人发表意见的主要网络平台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也能看到 AT(Ah Tiong,阿中,指中国人)的字眼,为不友善的称呼^①。

日常生活中,新移民认为当地华人会说华语而且听得懂普通话,也应该能够接受“中国”的习惯与行为,但新加坡华人认为,这是新移民不愿意“适应”新加坡社会的重要表现。可见,政策性压力对新移民中的公民与永久居民作用不同,但由公众态度构成的社会性压力却作用一致。本土华族成员不会自动将新移民视为内群体成员,群体边界反而在社会事件与日常交往中不断明晰化,内耗型群体关系不但影响华族整体凝聚力的提高,也阻碍族裔资本的累积与发挥效用。

五、总结与思考

与美国不同,新加坡社会强调各族群的地位平等与文化独特,这将有效抑制种族身份所带来的制度性歧视。在“沙拉碗”式融合理念下,种族差异性的有意保留使得移民融入新加坡社会很大程度上是融入由某一族群构成的社会体系中。因此,对于华族社群融合的研究也就必然包括两个层面,即华人新移民融入新加坡华人社会,华族成员在新加坡社会体系中的流动。

华族社群融合受到来自外部环境与内部社群双重因素的共同影响。外部环境压力主要来源于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所带来的代际流动下降,教育系统中的多阶段分流与高等教育扩张使贫困家庭面临阶层固化风险,劳动力市场分割加之高技术移民大量涌入对低技能劳动力生存与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在“新加坡人优先”的原则下,华族永久居民逐渐成为“二等公民”。华族社群成员、组织及新来华族成员之间的诸多变化也为融合带来许多压力。在内外压力的双重冲击下,华族社群成员及其后代确实面临许多融合风险。第一,低收入、低技能的华族成员最有可能面临向下流动的风险。第二,新移民要承受更多的政策性压力,融入成本节节攀高,“候鸟”式生活方式进一步强化对原有社会支

^①参见:吴中. 新移民政策下的新加坡“误读”[EB/OL]. [2017-06-19]. <http://www.xinminweekly.com.cn/News/Content/2113>.

持网络的依赖以及摇摆心理的产生。第三,新老华族成员群体边界清晰,内耗型互动不但不会自动消除,反而在社会事件与日常交往中强化,影响华族整体凝聚力的提高。

Portes 等指出,不同的融合模式也相应地提供了三种可运用的资源以应对融合挑战,分别是:①那些满足接收国政府援助计划的族群能够得到更多的帮助;②未受到社会偏见影响的族群其适应过程会更加顺利;③移民加入完善的、多样化的族裔社区网络能够获得政府资助项目之外的道义与物质资源^[28]。针对上述华族社群面临的融合压力及已存的融合裂痕,也应及时构建并完善旨在降低风险、消除裂痕的弥合机制。一方面,在包容性的社会建设理念下探索制度性弥合。例如,通过强化社会安全网,加大再分配力度,为华族底层成员提供更多的资源来缓和贫富差的冲击。在经济体制转型中,通过分担企业转型过渡期所带来的企业压力与个人风险来避免结构性失业,实现劳动力升级。通过加大教育投入,在优化人力资源的同时兼顾社会公平来真正激活社会流动。另一方面,构建多元服务型社会组织体系实现结构性弥合。受业已形成的群体偏见影响,即便是公共场所的偶然接触也透露出明显的近亲厌恶,这并不利于新老华人深层交往的产生及新移民社会网络的重建。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为新移民与新加坡华族成员实现亲密性交往提供了平台,使结构性融合成为可能。

[参 考 文 献]

- [1]任远, 郭民乐.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文献述评[J].人口研究, 2006, 30(3): 87-94.
- [2]黄朝翰, 赵力涛.新加坡社会发展转型[M].新加坡: 八方文化创作室, 2013: 64.
- [3]梁永佳, 阿嘎佐诗.在种族与国族之间:新加坡多元种族主义政策[J].西北民族研究, 2013(2): 88-98.
- [4]小木裕文, 刘晓民.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J].南洋资料译丛, 2003(1): 22-28.
- [5]PARK R E.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28, 33(6): 881-893.
- [6]WARNER W L.The social systems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5.
- [7]GORDON M M.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 [8]GANS H J.Second-generation decline: scenarios for the economic and ethnic futures of the post-1965 American immigrants [J].Ethnic & Racial Studies ,1992 ,15(2) :173-192.
- [9]PERLMANN J , WALDINGER R.Second generation decline? children of immigrants , past and present-a reconsideration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 1997 ,31(4) :893-922.
- [10]ALBA R ,NEE V.Rethinking assimilation theory for a new era of immigration[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 1997 , 31(4) :137-160.
- [11]PORTES A ,ZHOU M.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J].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 1993 ,530:74-96.
- [12]PORTES A ,RUMBAUT R G.Immigrant America:a portrait [M].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14.
- [13]MISHEL L ,BIVENS J ,GOULD E ,et al.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M]. 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 ,1993:79-80.
- [14]WATERS M C.Ethnic and racial identities of second-generation black immigrants in New York city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 1994 , 28(4) :795-820.
- [15]ZHOU M.Segmented assimilation: issues , controversies , and recent research on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J].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 1997 , 31(4) :975-971.
- [16]HILL M ,FEE L M.The politics of nation 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in Singapore [M]. 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 , 1995:31.

- [17]吴前进. 1990年以来中国—新加坡民间关系的发展:以中国新移民与当地华人社会的互动为例[J]. 社会科学, 2006(10):85-93.
- [18]刘宏.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形象:当地的视野与政策的考量[J].南洋问题研究,2012(2):69-77.
- [19]范磊.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认同困境与治理路径[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asporic Chinese Studies,2013,5(2):23-43.
- [20]RAHMAN MD M ,TONG CHEE KIONG.Integration policy in Singapore: a transnational inclusion approach [J]. Asian Ethnicity,2013,14(1):80-98.
- [21]SOLON G. A model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variation over time and place [EB/OL]. [2017-06-19].http://www-personal.umich.edu/~gsolon/workingpapers/ottawa.pdf.
- [22]NG I Y H.Educ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Singapore [J]. Educational Review,2014,66(3):362-376.
- [23]林琳. 侨这三十年 [M]. 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8:125.
- [24]刘宏.华人新移民的跨国流动和调适模式:英国与新加坡的比较分析 [M]//李元瑾,廖建裕.华人移民比较研究:适应与发展.新加坡:华裔馆,2010:163.
- [25]莊永康.新加坡华社研究 [M].新加坡:教育出版社,2002:26-28.
- [26]刘宏.跨国华人社会场域的动力与变迁:新加坡的个案分析 [J].东南亚研究,2013(4):56-67.
- [27]ORTIGA Y Y. Multiculturalism on its head:unexpected boundaries and new migration in Singapore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 Integration,2015,16(4):947-963.
- [28]PORTES A ,ZHOU M.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M].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ublications,1996:163.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of Ethnic Chinese Groups in Singapore under the Idea of "Salad Bowl"

SHI Qiuxia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ciology,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idea of "salad bowl", the integration of the ethnic Chinese groups in Singapore includes not only new immigrants integrating in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but also Chinese members flowing within this system. With the double impact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ethnic Chinese groups, members from the bottom of the community most likely to face the risk of downward mobility, and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of new immigrants has been extended or even interrupted under more policy pressure. The clear group boundary in old and new Chinese and internal friction interaction continue to strengthen in the social events and daily contacts, and affect the promotion of community cohesion.

Key words: ethnic integration; social environment; ethnic Chinese groups; double pressure; integration rift

[责任编辑 章 诚]